

---

# 王光輝先生、王雅志先生 訪問紀錄

主訪：柳照遠

記錄：余佩真

時間：2021年5月12日及2021年6月23日

地點：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54號

王光輝先生，出生於1928年，中學時代曾於上海就讀日本中學校。終戰後，從上海回到台灣，進入建國中學就讀，是建中第一屆橄欖球隊的成員。跳級考上台灣大學化學系，而後進入屏東衛生所工作直到退休。王雅志先生是其長子。

本訪問紀錄，藉由王光輝先生的經歷，來拼湊1947年228事件發生時，建國中學學生參與行動的一隅。以及透過王光輝先生的生命史，回看1920年代出生的知識菁英與其家族在時代變動中的境遇與認同。本訪談紀錄，還有另重點，我們也記錄了出生於1967年的王雅志先生，曾就讀師大附中、中央大學，而後留學美國南加大。他有機會接觸父親這一輩的建中人，看著這一代人逐漸凋零而有的感懷。這兩位訪談者所談及的雖都是其自身生活，但卻是台灣史的某一片段的小縮影，彌足珍貴。



建國中學橄欖球隊於1946年獲得全省中學橄欖球比賽優勝後的合照，中間排，左起第二位，脫帽者是王光輝先生。（王雅志先生提供）

## 一、家族背景

我1928年出生於屏東縣枋山鄉楓港，我的阿祖是王福。<sup>1</sup>原本王家世代是住在車埕，後來才到搬到楓港。我的祖父王福曾加入劉永福的在台灣南部部隊的軍隊，後來日本來台之後，需要有台灣人協助管理原住民的工作，就找王福合作。當時楓港一帶原住民有出草習慣，在楓港附近有一座山叫做草山，據說這座山只

1 王福，據檔案記載曾擔任台南縣恆春辦務署參事、恆春廳總務課參事、阿猴廳庶務課參事、阿猴廳楓港區區長、專賣局庶務課雇員、專賣局酒課雇員。出處：《臺灣列紳傳》（臺北：臺灣總督府，1916），340頁。

要有落石，原住民就會出草，出草就會很多傷亡。為了避免原住民經常出草，王福跟原住民溝通，還因此收養排灣族一個部落的族長的孩子，當義子，我們家族裡都叫這位是「蕃仔王子」，他後改了漢名叫王天賜。

王福當過阿猴廳<sup>2</sup>楓港的區長，因為管理蕃社的工作做的不錯，所以日本人就把阿猴這一地帶的治安維持的工作交給他。也從這時候開始，日本政府跟王福合作，王家也從王福開始，就有拿到鴉片、米、糖、鹽、火炭的特權，拿到的都是民生必需品的特權。因而王家就開始累積財富，後來王福還當過阿猴的參事，據說當時王家的資產大約是五萬日幣。不僅如此，王福在楓港地方就經營起一個「漳發行」<sup>3</sup>，類似現在的貿易公司。當時只要是王家的男丁，所從事的工作大概都跟「漳發行」有關。據我所知，日治時期高雄地區第一個信用合作社是王家，而不是陳中和家族。當時王家有錢，有資本夠做這種貸款的事。當時王家土地大約有五、六十甲，我小時候還經常到台北貴陽街，因為我們王家在台北貴陽街，就是現在萬華車站出來沒有多遠的地方。王家在這裡是經營布行跟米行。王福有兩個兒子，長子是王惠敏，次

2 阿猴廳是日治時期行政區劃之一，設立於1901年11月至1920年9月間，設立之初稱為阿猴廳，1905年改為阿猴廳，於1909年10月合併蕃薯寮廳和恆春廳，1920年被劃為高雄洲的一部分，阿猴廳範圍在州制實施後，劃為旗山、屏東、潮州、東港、恆春等五郡。出處：維基百科 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9%98%BF%E7%B7%B1%E5%BB%B3> 2021年11月1日擷取。

3 「漳發行」是王家的行號（有人說是「彰」或「漳」），創立者叫做「王福」，他與楓港地區歷史上的由舊庄遷至現址的遷庄有關，更在南番事變中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出處：<http://www.kslinh.url.tw/page/fonggang/wang.htm> 2021年11月1日擷取。

子是王啓智。王金星是屬王啓智這一支系，王金星是我的二叔，我直接稱呼二叔是因為王家是大家族，全部的人吃住都一起，人丁衆多，大家說好不分大房、二房，只按輩分來稱呼，所以我都稱呼王金星是二叔。我的阿公王惠敏，因為平時就不管事，只愛抽鴉片。但是我叔公王啓智為人霸氣，我小時候就很怕他。

王福於 1920 年過世後，「漳發行」就由我二叔公王啓智當總經理。王福在世時，就將我的爸爸王木星，送到日本讀書，後來王福過世後，家業由我的二叔公王啓智經營，但是他也繼續供應我爸爸在日本的生活所需，王啓智對我爸爸沒有太多嚴格的要求，反而很尊重他的選擇，讓他做他想做的事。我爸爸中學是在日本獨逸協會學校學德語。畢業後，留在日本繼續讀書，原本是唸醫科，聽說進醫科時，有堂大體解剖課，王木星第一次上大體解剖課時一直吐，後來覺得自己並不適合醫學，休學後改到九州去念法律。最後，畢業於日本九州大學法律學科第一期。我爸爸讀書讀很久，1928 年畢業時，已經 28 歲了，我想當時書應該沒有讀得很認真。我曾聽他講過，他在日本讀書時，常在書中發現夾有日幣，翻一翻書就可以找到 100 日幣，在當時 100 日幣很嚇人，當時一個老師的薪資不過 20 日幣左右。

王木星畢業後，在日本有考到律師執照，但因為台灣人在日本執業有所限制，後來他就決定回到台灣，參與王家「漳發行」的相關事業。二戰爆發後，我父親隨日本軍部前往中國上海佔領區，憑藉著家族的財力還有與日本軍部的關係，在上海從事貿易的工作，而兩年後，我們就舉家一起搬到上海住。戰後，一家人又隨爸爸回到台灣，1948 年他因腦溢血過世了。

我的媽媽是董玉梅，是一個很溫柔的人，她要結婚前，家裡

請來了一位福建的廚師，教她料理，從我爸爸胖胖的身材，知道我媽媽很會料理食物。我媽媽的家族是屏東車埕大戶人家，聽說董牡丹社事件時，西鄉從道來台灣的時候，送了兩把太刀<sup>4</sup>給我外曾祖父。我的外曾祖父很疼董玉梅，將兩把太刀，送給我媽媽當嫁妝帶到王家。這兩把太刀原本一直放在家裡，但是 228 事件發生後，家裡有人擔心家裡放著太刀，會被懷疑意圖，當時我七叔就把太刀帶到外海丟棄。

## 二、我的童年

我的阿祖王福，對於教育根本不懂，但是他人脈廣，認識一位日本人足立義比古先生，他是一位老師，王福接受這位足立老師的建議，將我的阿公王木星與叔公王金星送往日本求學。而在往後的時間裡，這位足立義比古老師與王木星的往來越來越頻繁，王木星也相當信任這位老師，王家的小孩讀書都經常會來請益他，也可以看出這位日本老師與我們王家的交情深是一代代建立起來。

1934 年我進入小學，我一年級到四年級是在台灣的學校讀書，我爸爸希望我能學好日語，希望我能接受傳統日本家庭的

4 太刀為日本刀的一類。一般而言指的是刀長超過兩尺、刀身彎度較高、一般以邊鋒朝下並吊在腰帶以下的方式配帶的日本刀。在刀刃向上切先向前的狀況下，太刀銘的位置通常是在與打刀相反的左面。參考自維基百科 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A4%AA%E5%88%80> 擷取日期 2021 年 5 月 27 日。

文化與教育方式。就把我送到這位日本老師家裡住，拜託這位足立老師照顧我。足立夫婦對我很照顧、相當疼我，讓我度過了很快樂的童年。我離開台灣前往上海前這段小學生活，我就是寄養在這位日本老師家裡。

二戰結束前，我在上海有聽說足立義比古老師回日本。光復後，開放觀光沒多久，1980年我聯繫上足立老師，知道老師住在九州，便從台灣出發到九州探望。我印象很深刻的是，我走到足立老師家的門口，我沒有報上名字，只是對著足立老師家的大門口喊「ごめんください」，足立老師也沒有看到我的人，只有聽到我的聲音就回答「光輝か？入れ！」，當時我也好驚訝老師還記得我的聲音，這時候的足立老師身體狀況並不好，那一次的拜訪，足立老師帶著我一起逛了九州許多地方，當時並不知道那是我跟他最後一次的見面，我回來一個月後，就收到足立老師過世的消息。

### 三、我的上海經驗

王木星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，日本軍占領上海，當時他說要去上海做貿易，王家當時掌握了當時一些專賣，還有戰略物資，又有日本的人脈，可以到上海跟日本軍部做生意。

1938年我到上海，大約是10歲，小學5年級，我跟著家人搬到上海市江安路定居，住的地方就在當時上海車站正門口的右邊那一帶。小學最後的兩年，我讀的是第五國民小學校，後來在上海繼續讀中學，當時日本在上海人口約有十萬人，所以上海日

本中學也有十間。這上海中學是日本官方出資辦的學校，為的是要教育他們日本人的子弟，所以學校老師的素質很高，教師都是日本文部省從日本內地選出來的派到上海，負責教育在上海的日本人子弟。當時在上海中學讀書時，台灣籍學生很少，但是商業學校裡台灣人就比較多，那是因為中學考不進去，就都到上海商業學校就讀。上海的中學要讀四年，畢業後再考高等學校。我是上海中學是第四屆畢業生，也是最後一屆在上海中學畢業的學生。我在上海讀中學時，一個班級幾乎都是日本人，台灣人只有2-3位，但是我並不會因為這樣就被歧視、欺負，反而是中學時代都跟日本人玩在一起，因為我體格很好，有時候還會管日本人，所以我完全沒有被日本人欺負的印象，印象中反而是看到台灣人會欺負台灣人。在上海中學時，我們校長嚴格要求要鍛鍊身體，所以每天早上要求學生要跑步，不管天氣如何，每天都要去跑步，我印象深刻的是，下雪的時候，校長還騎著腳踏車跟在學生後面，盯學生跑步。而我們的體格就是那時候打下的基礎，我當時最擅長的科目除了數學之外，就是體育。我上海中學時有一位大我兩屆的學長，他叫林永杰，<sup>5</sup>他體格很好，還是1980年莫斯科奧運台灣唯一派出去的柔道國際裁判。

我對當時在上海讀書時，有兩件印象深刻的事，其中一件事，水煎包是我們當時最常見的食物，看到水煎包就想起在上海的生活。在上海讀書時還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，上海有一個百樂門舞廳，事實上當時上海有名的是「百樂門大廈」，那棟建築約

5 國家文化資料庫，參考網址：[http://nrch.culture.tw/view.aspx?keyword=%E5%A5%A7%E9%81%8B%E6%9C%83&s=2298773&id=0000798561&proj=MOC\\_IMD\\_001](http://nrch.culture.tw/view.aspx?keyword=%E5%A5%A7%E9%81%8B%E6%9C%83&s=2298773&id=0000798561&proj=MOC_IMD_001) 2021年5月25日擷取。

有十層樓高，在當時算是最高的大樓，對我們來說這是很稀奇的事，所以我跟同學們課後，經常成群去看上海最高的大樓——「百樂門大廈」。

我中學畢業後，一般是要去當兵，當時我的媽媽說，既然都要當兵那就去考軍校。1945年報考日本在南京的日本軍事軍校，當時軍校考是要筆試也要口試，我當時筆試第二名。後來口試時，有個日本中佐的口考官問我：「你是台灣人為何來考日本軍校？」我回答說：「要報國就趁現在」，最後我口試第一名，筆試加上口試成績，我以第一名正取日本軍校。考上軍校後，學校通知我9月1日要去報到，但是沒有想到8月15日就戰爭結束了。

#### 四、回到台灣

終戰後，我還曾在上海看過日本戰機跟美國的野馬式戰機<sup>6</sup>，在上海上空比誰的迴旋快，日本戰機轉一圈的半徑比美國的野馬式戰機轉一圈的半徑來的小，我當時看著也想著，那為何日本會打敗仗呢？

終戰後，我的爸爸跟媽媽有討論要回去哪裡，我爸爸想去日本，他認為去日本會比較好。以當王木星的身份還有事業，終戰後要回日本也是可以。但是我媽媽一直想要回台灣，我媽媽強烈主張說「我們既然是台灣出生的台灣人，我們就要回台灣！」，

6 P-51 Mustang 稱為野馬式戰機，是二戰期間美國陸軍最有名的戰鬥機。參考維基百科：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P-51%E6%88%B0%E9%AC%A5%E6%A9%9F> 2021年6月5日擷取。

因為我媽媽的堅持，最後決定回台灣。1945年底前我爸爸、媽帶著我跟我的弟弟、妹妹們，從上海搭船--「たかごまる」（譯為：高砂號）回到台灣，之後從基隆上岸，我們再搭車回到屏東老家。

回到台灣之後，我們短暫的在屏東住一段時間，我的爸爸也會講排灣族語，1946年透過黃朝琴、連震東的介紹，他進入行政長官公署民政廳擔任「科員兼山地經濟股長」，<sup>7</sup>那一科就是管理原住民的科，跟我阿祖王福一樣當管理原住民的官。回到台灣後，因為爸爸要在台北工作的關係，不久我們全家就搬到台北來住，住在汀洲路上的一間日式房子，這房子就位在汀洲路與重慶南路交叉路口，當時我家門口還有一個萬新鐵路，<sup>8</sup>我們就住就在螢橋車站的正門口。這間日式房子原本的屋主是我爸爸一位日本人朋友的房子，我們會搬到這裡住的原因是，我父親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了一位久未見面的朋友，這位日本人是在屏東四重溪溫泉某旅館管理者。我父親跟他提起將要在台北工作，正在找房子的事，這位日本朋友說起，他在台北汀洲路上有一棟日式房子，因為戰爭結束，他將要被遣送回去日本，就跟我爸爸說「那間房子送給你」，我們家就這樣全家搬到這間日式房子住，我大約在汀洲路這間日式房子住2-3年時間。

7 受訪者訪談提到王木星是任職「總統府民政廳第五科」。經考證王木星1946年擔任行政長官公署民政廳「科員兼山地經濟股長」，出處：行政長官公署編印，《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職員通訊錄》，頁23。

8 參考自淡水維基館 [http://tamsui.dils.tku.edu.tw/wiki/index.php/%E6%B1%80%E5%B7%9E%E8%B7%AF\(%E8%90%AC%E6%96%B0%E9%90%B5%E8%B7%AF\)](http://tamsui.dils.tku.edu.tw/wiki/index.php/%E6%B1%80%E5%B7%9E%E8%B7%AF(%E8%90%AC%E6%96%B0%E9%90%B5%E8%B7%AF)) 2021年5月6日擷取。

## 五、我與建國中學

1945年二戰結束時，我當時剛中學畢業，17歲時回到台灣，我是以同等學歷申請進入建國中學（以下簡稱：建中）。我1946年在建中讀第一年的時候，印象中，老師上課幾乎都用日文講課，當時從中國來的老師很少，幾乎都是台灣籍老師。進入建中讀書後我發現，同學很多因為戰爭都疏於學業，所以我當時感受到，我跟他們學業程度有所不同。印象中當時建中的師資，相較於當時的上海中學的師資，比較起來是有差距。我當時上海中學畢業後，程度相當於應該是建中的二年級，但是我還是從一年級讀起。

我加入由張昭雄<sup>9</sup>組建的橄欖球隊，張昭雄的叔叔是張耀堂<sup>10</sup>。我會加入橄欖球隊都是因為鍾雙麟看我很會跑步，就邀我一起參加球隊，我說我不會打橄欖球，他說橄欖球就是將球抱著就一直跑就可以了，我就這樣加入建中第一屆橄欖球隊。但是高二升高三那一年暑假，我就跳級去考試大學，考進台灣大學化學系，所以沒有拿到建中畢業證書。

9 張昭雄，台北木柵人，是建國中學橄欖球隊建隊的靈魂人物。原文刊載於王增裕，〈為什麼橄欖球精神會成為建中精神〉，《黑衫軍》，頁54-55。

10 張耀堂，臺北木柵人，出身望族，其父張德明在清代為拳山堡內湖莊地方總理，曾在木柵開人張達斌麾下任參謀長。日治時期曾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通譯、臺北州議會議員、木柵區長、深坑庄長。張耀堂先後畢業於木柵公學校、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（臺北師範學校前身）、東京高等師範學校（筑波大學前身）。1921年（大正10年）3月，張耀堂取得文學士學位，隨即返臺從事教育工作。1945年12月，轉任戰後臺北建國中學首任校長，翌年7月卸職。參考自：邱各容，〈被遺忘的一方天地—張耀堂〉，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，2007年10月號，頁8-16。

我讀建中時期，我們這一班是台灣人的學生，外省人全部在另一班，但是有些台灣人想趕緊學會國語，就特別轉到外省人那一班跟外省人一起，增加學習國語的機會，當時我們這一班台灣人就剩下22位。我在建中時並沒有聽到或是看到有外省人會欺負台灣人的事，我們只是不會跟外省人在一起讀書或是玩。我在建中時期，我跟劉敏雄、<sup>11</sup>曾景輝，吳沃熙<sup>12</sup>關係不錯。現在這些同學都已經過世了，建中同學現在還在的大概只剩下我跟鍾雙麟。<sup>13</sup>1947年228事件後，我有一些同學，在高中二年級就考到大陸去讀大學，當時我並沒有想去大陸讀大學，原因是我才剛從上海回來不久，我在上海住過很長的時間，我對大陸沒有什麼羨慕，所以我並沒有很想去大陸讀書，覺得在台灣讀書就很好。

11 劉敏雄，台南出生，在台南、新竹讀小學，後來隨著他父親（劉茂雲）的工作調動，回到台北，住在台北同安街一帶，住的是一棟日本式建築。我父親體格不錯，他有練劍道，也喜歡打棒球。據我父親說，1940年戰爭期，他幾乎沒有在讀書，因為被調去新竹南寮蓋機場或是躲空襲。我父親建國中學畢業後考上台大化工系，後來進入台電工作三年，又到私人企業公司當研究員，一直到退休。參考：〈劉一美女士訪談紀錄〉，2021年7月21日訪談。（未刊稿）

12 吳沃熙，申請賠償時自述「民國卅六年三月一日左右，本人當時為建中學生，與同學陳炎陳在往公館路上被士兵逮捕，當場被毒打後送到某單獨牢房羈押。過約三個星期後，又被轉送至綜合牢房羈押，當時並見到同學李德昌、郭國純亦在牢房中。之後，本人被強迫認罪，判處有期徒刑五年、緩刑五年，前後羈押約五、六個月。」出處：「228基金會賠償檔案」，第〇一四八八號。

13 鍾雙麟，1928年生，是建國中學第一屆黑衫軍橄欖球隊的成員，保有多項體育紀錄。1947年228事件後，層逃往角板山躲藏了1-2個月。228事件後，繼續回到學校讀書，大三時跳級考進台大電機系，創辦全台電機，曾自述出版《九十自述：鍾雙霖回憶錄》。現年94歲。參考：〈鍾雙麟訪談紀錄〉，2021年4月9日訪談。（未刊稿）。

張萬傳是我們橄欖球教練，教我們打橄欖球，張老師跟我們感情很好。但是他的專業其實是美術，是我在建中時期，他並沒有教過我們畫圖。在建中參加橄欖球比賽，印象深刻的事，是有一回獲得優勝獎，全體拍完大合照拍完後，我的老師帶我們去華西街，那是我第一次喝酒的體驗。

## 六、我所知道的 228 事件

1947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，我印象中都是學生在活動，老師好像都跟我們脫離關係，沒有跟我們一起參與行動。我們原本有預計行動，原定 3 月 4 日在建中校門口集合，當時我也帶著兩顆手榴彈前往。我的手榴彈是我姑丈在日本戰敗後，有幫忙日本軍隊把一些軍需品搬到高雄壽山藏，當時我姑丈就有偷拿了 6 顆手榴彈，有 2 顆就送給我。集合學生裡面只有我帶手榴彈，其他的人身上是都帶著武士刀。我雖然拿著手榴彈，但是我也沒有當過日本兵，也不知道要怎麼使用手榴彈，對這武器，我完全沒有概念。

我們集合時間大約是在傍晚，當時建中門口來了很多學生，大家聚集在一起有聊，要去攻打哪裡，有聽說要去攻警察學校，<sup>14</sup> 但是當時沒有主要領導者，大家只是聚在一起聊，當中每個人都有不同意見，但是當時沒有組織，我們一群學生，也沒攻

<sup>14</sup> 警察學校應為「日治時期的總督府設立的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」，今臺北市立龍山國中。

打計畫，連要怎麼打、怎麼攻都沒有想過，也不知道。最後，就這樣一直到隔天凌晨，有人說要出去看一下，但是就沒有再回來，到了凌晨 4 點多時，我們還是沒有行動，我們一群人就在建中門口解散了。解散後，我帶去的那兩顆手榴彈又帶回家，我回到家也很擔心，怕若有人被抓，會說出我有手榴彈的事，所以把我記得我回來後，在我家的庭院挖了一個洞，就把手榴彈埋掉。而這次的行動後，幸好我也未曾受到影響，就繼續回到建中讀書。

二二八事件中的受難者 -- 黃守義，是我的同學，他在二二八時被外省兵仔開槍打死，看到這件事發生的是黃守義的姊姊，事情發生沒有多久，我曾經去問黃守義的姊姊，據他的姊姊說，他們當時住在中山北路一條通的巷口附近，228 發生後，有一天黃守義外出，就在離家不遠處，有人看到黃守義被外省兵仔攔下來後，這個人就趕緊跑到黃守義家，跟黃守義的姐姐說「你弟弟被外省人兵仔抓住」，黃守義的姐姐一聽，趕緊衝出來，一個轉彎在六條通附近，就看到遠處他的弟弟左手或是右手有舉起來的動作，然後瞬間有一個坐在軍用車上的外省兵仔，一槍就把他弟弟打死。依據我當時的看法是，當時黃守義隨身有攜帶「脇差」<sup>15</sup>，可能外省兵仔看到，就直接開槍打死他。

我的叔叔是王金星，他在 1947 年 228 事件中死亡，我爸爸因為他的弟弟王金星<sup>16</sup> 的受難，相當的傷心，心裡也很不高興，

<sup>15</sup> 「脇差」(わきざし)，長 1-2 尺的單手用小刀，參考自維基百科 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84%87%E5%B7%AE> 2021 年 6 月 2 日。

<sup>16</sup> 關於王金星相關的訪談請參見〈王淑媛、王揚名姊弟訪談紀錄〉，收錄於《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談紀錄(下)》，頁 365-373。

決定離開台北，全家又搬回屏東，他當時就把汀洲路這房子捐給當時的公家單位。按照當時的情況，原本這日式房子是朋友給送給我爸爸，我爸爸可以主張這房子是自己的，但是他沒有占為己有，而是把房子捐出去。我爸爸從行政長官公署民政廳「科員兼山地經濟股長」離職，<sup>17</sup> 回到屏東，經由一位在屏東女中教書的學長推薦，進入屏東女中教書，<sup>18</sup> 他是數學、公民老師。我的夫人還曾在屏東女中念書時，曾看過我的爸爸。1948年9月，早上氣溫非常低，且非常冷，我父親早上4點就起床，6點左右載我去搭火車回台北，那天是我要去台灣大學的註冊日，送我搭上火車後，當天上午9點我父親就腦溢血過世，當時49歲。

父親的過世，我突然遭逢家變，我母親獨力要撫育我與兩位姐姐1個弟弟，生活陷入困境。我在台大畢業後去拜訪我爸當年在日本獨逸協會學校<sup>19</sup>時期的同學—張暮年<sup>20</sup>，由他引薦我才得以

17 王木星 1946年擔任行政長官公署民政廳「科員兼山地經濟股長」，出處：行政長官公署編印，《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職員通訊錄》，頁23。

18 昭和7年(1932)，4月高雄州立屏東第一高等女學校成立，民國34年(1945)，10月，台灣省長官公署教育處派李志傳先生接收，擔任首任校長。隔年，6月，更改校名為「台灣省立屏東女子中學」。出處：維基百科，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9C%8B%E7%AB%8B%E5%B1%8F%E6%9D%B1%E5%A5%B3%E5%AD%90%E9%AB%98%E7%B4%9A%E4%B8%AD%E5%AD%B8> 2021年6月1日擷取。

19 獨逸学協會學校，1883年成立，1893年改為獨逸学協會中學，參考自[https://www.dokkyo.ed.jp/school\\_introduction/history](https://www.dokkyo.ed.jp/school_introduction/history) 2021年6月5日擷取。

20 張暮年(1901-2003)，大稻埕公學校畢業，1918年進入京獨乙協會中學就讀，而後進入東京慈惠醫科大學豫科，1929年取得學位返台，先後任職台北醫院、如水社會事業部附屬醫院院長，從事社會事業的醫療工作，1930年開設茂年醫院，1945年11月行政長官公署核派台北州接管委員會，授命擔任台北縣民政衛生局衛生課課長。1946年仁濟院成立擔

進入屏東衛生所工作。

我的家族從我王福那代建立起的家族事業，來到我的爸爸雖已經是第四代了，但是我們家道還很殷實，若是二戰日本沒有戰敗，王木星在上海的事業還可以持續。回想昭和天皇玉音放送那一天，我跟我的日本同學聚集在一起，聽完玉音放送的時候，我有一個日本同學問我說：「王さん，你要變成中國人了。」我當時回他「しょうがない」（沒有辦法！），當時我內心充滿無奈。二二八事件對我家族的影響，我的阿叔王金星為了保護鄉民卻因此受難，我的爸爸因為他的弟弟的死亡，心裡難過，帶著我們全家回到屏東。王木星過世後，隨著政府土地改革政策，三七五減租、耕者有其田一連串施行下來，我們這一房的家境就不如以往了。

## 八、王雅志先生談父親與那一代的人與事

### 1. 我的父親與母親

我祖母董玉梅會講多種語言，台語、客語、日語、國語、排灣族語等，會5、6種語言，且他也曾經住過上海，所以上海話也會講。1975年蔣介石過世後，遺體在國父紀念館開放給大家瞻仰遺容，那時候我媽媽陳玉斷也跟我的祖母一同前往。當天我祖母穿著一身旗袍跟我媽媽一同搭著計程車前往國父紀念館。原

任院長兼理事，重返日本慈惠醫大專攻環境衛生與精神醫學。其一生對於台灣的老人照顧安養醫療有卓越的貢獻。出處：《續修臺北市志 卷九 人物志 社會與文化篇》，頁295-296。



本瞻仰遺容隊伍很長，每個人都要排隊要排很久，但是我祖母跟我媽媽一下計程車的時候，卻不用排隊，因為人家看到我祖母穿著以及他講話的口音，以為她是官夫人，因為她的穿著與氣質，還有會講一口流利的上海話，所以當時在現場的憲兵以為她是外省的官夫人，對她相當禮遇。

我父親王光輝跟我母親陳玉斷是在 1954 年經由我七叔公的介紹而結婚，到 1961 才生下我姐姐，1970 年生我小弟，我在家排行第二。根據我父親的說法是說，他們結婚六、七年都未能懷孕生小孩，當時我的外祖母聽人家說，高雄旗尾的鳳林寺的濟公很靈，所以我外祖母就帶我父親跟母親一起去那間廟求子，求完回來一個月後，我的媽媽就懷孕，後來就生下我的姊姊後，又過很久又都沒有能再懷孕，我爸媽又去求，求完之後就懷了我，但是我出生後身體狀況不好，我小時候生病差點救不活，是我父親的建中時期同學林啓豐，將我醫好。不過，當時我爸媽擔心我身體太差，萬一無法活下去，家裡就沒有男孩，所以我爸媽又再度去那間廟求子，沒有多久我媽就又懷孕，就生下我弟弟。也因為有這段姻緣，所以每次我們回高雄時，我父親都會帶我們一家人一起去那間廟拜拜，表達感謝。

## 2. 我的童年

我從幼稚園時就很不聽話，經常打其他小朋友，我記得有一回我的祖母還因為我在幼稚園闖禍，我祖母去幼稚園把我帶回來。在學校闖禍的情況一直到小學四年級時都經常發生，我小時候真的也不學好。一直到了我小學四年級，出了一點狀況，我印象很深刻，那一天我祖母買了一個肉鬆麵包給我，把我叫到

房間，開始對我講我們王家的故事，她最後用台語講了一句話「你做什麼都可以，但是不要讓祖先蒙羞」，當時我抱著我祖母痛哭，我跟我祖母說「我再也不會這樣」，而我從那時候開始不再與他人打架，行為也開始收斂。

我小學五年級時開始學日語，我想學日語的原因是，在這之前我無法好好地跟我父親溝通。我的祖母雖然很會講台語，但是我的父親長期受日本教育，並沒有學會台語，我父親在娶我母親之前是不太會講台語，是為了要娶我母親時，要跟我外祖母溝通，他才開始學習台語。我父親跟我母親結婚後，他們生活上的溝通用語幾乎都是用日語，而我想要跟父親講的話，經常需要母親來翻成日語講給他聽，因為我講國語，我父親聽不太懂。因為這樣，我們父子之間的溝通產生了很大的障礙。當時我還是小孩子，知道學習日語的管道只有卡通，所以我就開始看當時的日本卡通，例如：無敵鐵金剛，一邊看；一邊開始學日文。

## 2. 我思想的轉變

1975 年 4 月 5 日，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天，當天我跟父親住在我二叔家，準備隔天要去掃墓。正當大家都在準備東西時，突然聽到我堂妹大喊「總統死了、總統死了」，我父親為了制止，便大聲喊「不要亂講，怎可以講總統死了這樣的話。」，蔣介石死後，學校教我們要背先總統蔣公遺囑，我記得有一天下課後，我在家裡又再背蔣公遺囑，被我父親聽到，他突然用台語對我說「背這個要做什麼？蔣介石以前會殺人」。我一聽愣住，還回他：「他殺了什麼人？」，我父親就說「你二叔公王金星就是被槍殺」。當時我母親在廚房，一聽到我爸提起這件事，從廚房衝出

來制止我父親繼續講下去，且對我父親大吼說「你講這個要做什麼。」當時我很驚訝，我驚訝我的家族有這段過去，但是我更驚訝我母親的激動的話語跟情緒。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我二叔公王金星的事，聽到這件事，對我來說太震撼。在這之前，我的腦袋裡面想的就是「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」，但是直到蔣介石過世後，我開始聽我父親及親戚談我二叔公王金星被槍殺的事，我開始對過去自以為的「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」的想法這件事，逐漸有了改變。

### 3. 認同的確立

1982年我考上師大附中，原本我爸爸不讓我去念附中，希望我去重考。後來，我跟我爸爸一起走了一趟師大附中，當時師大附中有一個美術館，保留日本時期的武道館建築，<sup>21</sup>我爸爸一看，覺得師大附中還保留日治時期的建築，認為這個學校可以念，就同意讓我去唸師大附中。但是這棟日式建築，在我去唸的第二年就被拆除，這當然是之後的事。師大附中畢業後，1985年我考上中央大學，當時我住宿，跟我同寢室有四個室友，他們的父母親都是受日本教育，親戚也有跟二二八有點相關，因為有這層關係，我們就開始經常在一起談過去台灣的歷史，或是聊彼此的原生家庭與家族。也因為我們的父母或是親戚有相同的經

21 師大附中武道館在1985年10月拆除改建。原本這武道館在日治時期是第三中學的武道館，是一座磚造木地板的「武道館」，作為摔角、劍道、柔道等運動之用。參考師大附中校史室 <https://site.hs.ntnu.edu.tw/school/history/%E9%99%84%E4%B8%AD%E8%AE%8A%E9%81%B7%E5%8F%B2/> 2021年6月10日。

歷，因此我們之間彼此建立起很好的關係。

我大學畢業前，曾想過要去日本留學，因為我受到爸爸的影響，經常聽起他說「日本非常的好」。一直到我退伍後，我才改變想去日本留學的念頭，轉向前往美國。之所以會改變留學的地方，原因是我記得我是五月底退伍，退伍第二天，1991年6月1日我去參加我大學同學會，在同學會中，聽到我們班的男同學們多數都將去美國留學，我當時也受到了影響，放棄去日本留學，開始準備前往美國留學。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那一年我到了美國南加大讀電機碩士。我提早一、兩個月到南加大，當時有一位在南加大留學的台灣人學長來接我，我後來才知道，他是南加大台灣同鄉會的成員。在當時在海外，是滿忌諱在同學會或是同鄉會的前面冠上「台灣」這個詞。在當時南加大還有一個中華文化社，我們又稱他C.C.C.，<sup>22</sup>這是國民黨所辦的同學會。但是我到南加大時，我參加的是南加大台灣同鄉會，這同鄉會經常辦讀書會，當時我們還請過不少名人來參加我們讀書會的導讀者，印象中也曾經邀請過陳師孟來讀書會導讀。

1993年在南加大的暑假，中國發表《台灣的問題與中共的統一》白皮書，中國發表後的第二天還是第三天，我們南加大台灣同鄉會的成員，就前往洛杉磯，與在地的台灣同鄉會會合，我們跑到中國駐洛杉磯的領事館去抗議。我們在領事館外面繞兩圈，還燒了中國的國旗，據說我當時有被媒體拍到，還登上了電視，我的一位同學還打電話來跟我說這件事。示威抗議事件後，我就

22 南加州大學中華文化社 (Chinese Culture Club,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)，簡稱CCC。是台灣在南加大留學生的主要社團組織，於1989年由創社社長江明修先生創立。

被當局關注，有一件事可以證明我的猜測。當時我在南加大讀書時，我的通訊資地登記的是我三叔家的地址跟電話。1994年我從南加大畢業回到台灣，大約是在我回台灣半年後，聽我堂姊講起，她曾在家中接到一通很奇怪的電話，一聽就知道是大陸人口音，電話那一頭說要找王雅志，我堂姊問說：「你找他有什麼事」。電話那一頭說：「王雅志搞台獨的，跑回台灣阿。」，有這麼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。

#### 4. 父親對我的教育

3歲時，1970年我跟隨爸媽搬到台北定居，最早是住在台北志光街，1971年又搬到永和，隔沒幾年，1974年又搬家。我小學是就讀永和竹林小學，小學時我印象深刻的是，我到了小學二年級時都是講國語，我回家都用國語在講，我爸聽不懂我在講什麼，我媽媽就將我講的話，翻成日語講給我爸聽。而我跟我父親之間，我講國語，我爸爸都講台語，因語言造成我們之間的隔閡，但是台語也並非是我爸爸熟悉的母語，他學台語是為了能跟我外祖母溝通，因為我外祖母只會講台語，也因為這個因素我爸爸才學會台語，而我爸媽溝通的語言一直是日文。我的小學時期受到的語言教育都是講國語，加上我又住在永和，永和是很典型的眷村居多的地方，這些總總因素，導致我小時候非常排斥台灣文化，所以我的國語講得比台語好，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。

說起我父親對我的教育，我覺得有兩件印象深刻的事，一件事是我當兵時，我是當預官，下部隊前，我父親還很慎重的跟我講「要善待阿兵哥」。我很驚訝，我父親交代我的事，並不是跟

我說要平安回來，而是「要善待阿兵哥」，我當下無法理解這話的意思，因為我並不是職業軍人，後來越了解我父親之後，知道他受日本教育，且又曾經考上過日本軍事學校，但是因為終戰，他未能如願當日本軍官，也許他未能做的事，希望我能把他心中的那個想法做到。我退伍時，我有自己問過自己，我應該有做到我父親希望我做的事吧。

第二件事，我留學回來後，因為我是主修電機，我便進入半導體業，這行業在這二、三十年猶如護國神山，我當時也賺不少，賺的多要繳的稅也高。有一次我就跟我父親說，我們有沒有方法來逃稅？錢賺那麼多都交給政府，台灣最高稅率是40%，我就是要繳到這麼多，我父親聽完就跟我說「為何要逃稅，台灣有多少人可以繳到40%的稅金？這是一個光榮的事。」聽完我父親一席話，我從此就再也不沒有想過要逃稅的事。

#### 5. 父親的建中同學

2003年到2006年，有約3年的時間，我被南亞科技公司派駐德國英飛凌公司。2006年我從德國回來台灣後，那一年我跟我父親的關係更加親近。那個轉變是，當時我看到我爸按照往常又想去日本參加學生時期同學辦的同學會，但是我看到他年邁的身軀，我放心不下，所以我就陪著他去日本，從那時候我開始認識不少他在上海時期的同學。回台灣後，同年我又跟著他去參加他建中時期的同學會。因此我跟這些叔叔、伯伯逐漸熟悉，也經常藉由聚會見面，跟他們談過很多話。我印象中2006年那場建中同學會大約有8-9位，到了2018年聚會時大概剩下3位，這三位分別是康佐榮先生跟鍾雙麟先生。他們兩位跟我的父親是

建中第一屆的同學，也是橄欖球隊隊友。現在就剩下我爸跟鍾雙麟先生。我一直很希望能早幾年有人能做他們這一代人的訪談紀錄，而現在要找到我爸爸這一屆的校友訪談，已經很困難了。

## 6. 感想

我記得早期只有三家電視台，新聞都是七點開始，1985年12月25日那一天，我跟我父親一起在看李四端主播的台視新聞，我印象很深刻，當時主播說著「今天是民國74年12月25日，也是台灣光復40週年紀念日」，話才一說完，我父親轉頭問了我「如果有一天因為政治上的因素，你可能要從台灣人變成菲律賓人，你覺得好不好？」我回答我「我不要」，我父親繼續問我「為什麼不要？」，我回答我「因為菲律賓感覺很亂很糟，我不要做菲律賓人。」父親聽完我的回答，對著我說「兒子，四十年前我想的跟你一樣。」這50年來我經常聽很多家族的故事，我們王家有王福、王木星、王金星、王壽淋<sup>23</sup>、王英典，<sup>24</sup>被放到《枋山鄉志》，而鄉誌裡面提到有關我們王家的故事、事蹟，都是我耳熟能詳的事。

23 王壽淋(1921-2000)，楓港人。1937年赴日本明治大學附屬中學就讀，1942年畢業後回台，服務於枋山鄉公所，1946年奉派任枋山鄉副鄉長，1947-1957年間擔任獅子鄉副鄉長、獅子鄉內獅及草埔國小校長…等職，其為人獲得鄉民支持，當選第四屆、第五屆鄉長。出處：《枋山鄉誌》，屏東：枋山鄉公所，2010，頁338。

24 王英典，1950年生，曾就讀於楓港國小、恆春中學，而後就讀第二士官學校常備士官班，陸軍官校第41期畢業，曾留美念飛彈儲訓班，軍旅生活直到1998年退休。出處：《枋山鄉誌》，屏東：枋山鄉公所，2010，頁354。

感謝：本訪談緣起於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展出「二二八與校園：事件中的建國中學」時，王光輝與王雅志先生來參訪後，經紀念館的鄭乃瑋先生、陳文恬小姐的協助聯繫，才有機會能開啓建中校友的訪談，於訪問紀錄的文末，也向兩位致上感謝之意。